博鳌亚洲论坛分论坛上，经济界人士热议——

供给侧改革描绘中国经济新风景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袁 勇

聚焦

在国内经济步入新常态、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途径是什么？在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换个角度看经济：供给侧的风景”分论坛上，多位经济专业人士就这些话题展开了讨论。

以改革满足市场需求

“全球需求呈现疲软状态，中国开始寻求更多内在需求，通过改革，中国有能力实现这样的转变。”在世界贸易组织（WTO）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库普曼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结构从过去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的一个转变路径。

“过去，我们曾经通过各种政策刺激提升需求，就像一个人吃不下饭时，就给他开点儿开胃药，刺激一下他的胃口。现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像补肾，通过改革，增加经济体的活力。”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李稻葵则用这样一个比喻阐述了他的看法，“经济主体有活力了，才愿意投资、愿意开发新市场”。

中国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认可李稻葵的观点，他认为，在通过一定的政策刺激提升需求后，要保证供给侧产品质量满足变化后的需求，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要做的工作。“如果一个人的胃口变大了，但是想吃的东西却没有，不想吃的东西一大堆，这也是会出问题的。”龙永图说。

“国内有很多产品需求是很大的，但是生产能力却十分有限，只能大量使用进口产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进一步解释，去年中国进口的制造业产品金额达到1.2万亿美元，这说明国内需求很大，但是因为国内不能生产满足需求的产品才去进口。

以创新弥补供给短板

补短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从生产层面来说，中国的供给侧生产能力存在哪些短板？李稻葵认为，从产品类型上来说，中国的供给侧生产能力在工业品方面相对较强，在消费品类特别是高端消费品类则相对较弱。“以汽车行业为例，中国的客车竞争力很强，我到迪拜参加会议，发现用的全是中国的金龙客车。为什么金龙客车能赢过国外产品？因为它安全、性价比高，企业采购最看重的就是这些品质。但是，中国的轿车产品竞争力就没那么强了，为什么？因为买轿车的人一般就是开车的人，他的主观感受是非常细腻的，对产品细节要求很高，这方面我们的生产能力还不够。”李稻葵说。

李稻葵还认为，品牌和市场营销方面的不足，也是影响国内产品品质的重要因素，“中国的工程能力和技术能力相对而言都是比较强的，工程机械、造桥、高铁方面都比较强，但马桶盖却比不过国外产品，一个重要原因是品牌和市场营销做得还不够”。

短板该怎么补？在龙永图看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创新的重要性是一种普遍共识，“创新是整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手段，只要把创新抓住了，我觉得改革就会成功”。

对此，李稻葵补充道，制度创新是整个经济体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我们不缺乏市场层面的创新，比如这两年在互联网经济方面，企业的创新非常多，现在我们主要缺的是制度上的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不足，束缚了手脚。制度创新能够突破，才能够进一步拉动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

林毅夫则认为，公平的竞争环境和适当的产业政策都对提升创新能力至关重要，“对于一个新出现的产业，早期应该有一定的产业政策给予支持，鼓励创新。与此同时，产业政策应该注意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让企业在竞争中决定发展”。

根本目的是人民福祉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找准前行的方向至关重要。罗伯特·库普曼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应该是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改革的过程中，我们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大’和‘富’的选择。当然，如果要‘富’的话，中国这么多人口，就必须要‘大’。但是改革的根本目标不应该是‘成为最大的’，应该是成为‘比较富裕的’”。

龙永图认为，库普曼的看法和中国的治国理念十分相似，“习近平主席讲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相比于中国的GDP有多大体量，我们更在乎的是老百姓是不是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也是最近几年我们整个发展目标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

龙永图说，中国经济从过去单纯追求数量的增长，到现在转变为追求质量的提升，正是这种目标变化的体现，“追求质量的提升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干净的水、新鲜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安全的环境以及宜居的城市等，如果能满足这些消费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成功了”。

坚持博鳌

本报博鳌3月26日电 记者杨忠阳报道：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26日发布促进经济全球化宣言，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和全球企业界坚持推进市场开放、包容性增长和经济合作，确保经济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增长。

宣言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在过去几十年中，它有力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也持续推动了全球范围的减贫进程不断取得进展。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不在于经济全球化本身，是由于现行全球治理体制同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化不相适应造成的。采取逆全球化措施，不可能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甚至会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挑战。世界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改革全球治理体系。

——各国政府应视经济全球化为积极力量，在经济主权、权利与义务公平对等的原则基础上，通过加强对话与合作改革和完善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各国政府必须共同采取相应的政策，确保经济全球化惠及更大的范围。

——跨境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各国政府应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共同坚持和进一步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并不断改革和完善多边贸易投资机制和治理，确保全球共同繁荣。

——WTO、APEC等国际和地区机构应携手解决自贸安排碎片化问题，探讨建立更加开放、包容和公平合理的双、多边贸易制度安排。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应在加强自身改革的同时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充分发挥跨国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有效防止和减轻游资套利和投机对实体经济造成负面冲击。

——技术创新以及知识与信息的跨境流动有助于缩小南北差距、贫富差距。各国应开展灵活多样的跨境PPP合作模式积极推动技术创新，促进知识与信息跨境流动的便利化，使之惠及所有国家地区、所有阶层、所有群体。

——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平衡发展，各国际机构以及G20、APEC等多边机制，有关各国政府、各相关私人部门，应该支持和建立开放的多边合作机制，共同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机制制度互联互通、人文交流互联互通。

宣言强调，博鳌亚洲论坛及全体会员愿意在上述诸方面加强沟通、协调与合作，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发挥自身的独特作用。

特写

把未来带到当下

本报记者 朱 琳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家庭愿意开放自己的厨房，让别人走到自己家里来，或者是利用自己的厨房，为别人提供安心的饭菜。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未来的场景是：一部分人不用做饭了，一部分人愿意做饭给别人吃，一部分人去另外一部分人家里享受吃饭这件事。”“回家吃饭”创始人兼CEO唐万里的一席话，让博鳌亚洲论坛“分享经济：谁来定义”的分论坛现场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我们其实没那么关注分享或是共享的概念，我们关心的是，能不能提供以往没有的吃饭方式，让消费者多一种选择。”

“分享经济”优化配置了闲置资源，提高了物品的使用率，满足了人们的各种需求，同时改善了体验。但这类的产品模式也引起了不少争论和质疑。在小猪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陈驰看来，分享经济完全不用担心信用体系问题。“共享经济模式大多依托互联网平台，信息流动、传播和反馈非常快。比如，你在蚂蜂窝网站上的预订体验很好，一定会给出好评，而且60%的照片会有自己和家人出镜。这样的信息真实、可信、可靠。同样，如果公司服务做得不好，用户给差评，那么想在蚂蜂窝里面持续获得更高质量更多利润的订单，是非常困难的。”

转转公司CEO黄炜也表示赞同，“我们选择相信用户，这跟带孩子一样，孩子小的时候，天天这个不准做，那个不准做，可能会限制孩子的成长空间和可能性。我们对用户也是这样，给用户空间，让用户成长”。他认为，新的共享企业，会建立一套个人到个人的信用体系，如果把数据从某种程度上打通的话，共享经济能让人的信用变得更好。“我们要投入精力去做的，是如何结合互联网技术，结合已有的信用体系，让用户享受到更好的产品。”

有报告指出，2016年中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34520亿元。参与总人数达到6亿，比上年增加1亿人左右。唐万里认为，分享经济还有很多的潜在可能，存在于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我们所做的，是希望把未来带到当下，通过分享更高效地满足人的需求，让更多的人有所获得”。

现场

绿色金融如何牵手精准扶贫

本报记者 何 伟

博鳌亚洲论坛“金融业的‘绿色革命’”分论坛25日下午在博鳌举行，金融业的绿色化该如何推进、绿色金融该干些什么等话题成为关注的焦点。

“环保本身就包含绿色革命的含义，特别是绿色金融，‘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明白这些话的深刻含义，绿色金融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很清楚了。”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理事长吴伟雄说。

在回答《经济日报》记者关于绿色金融如何在农业、扶贫等方面发挥作用的提问时，吴伟雄表示，绿色金融目前更多是融入绿色环保的大项目当中，针对脱贫致富的帮扶度不够，未来应当平衡资金流向，牵手精准扶贫，打造绿色、高效农业，为“三农”发展贡献力量。

据统计，2016年，海南省农信社发放给农民的小额贷款额近38亿元，几乎都用于风险较高的农业项目，对17059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贷款近4.8亿元。与之相对应的是，海南省农信社贷款不良额和不良率还连续两年实现“双降”，2016年末，贷款不良率仅为2.39%。

为何将大量资金投入到高风险的绿色农业项目当中？吴伟雄表示，海南农信社“一手给资金、一手给技术”的贷款方式属于“绿色信贷”，很好地阐述了金融机构如何扶持绿色循环经济。

“我认为只要做到‘真情投入、调查进屋、培训到户、金额适度、职责各负’，绿色经济包括绿色农业的信贷风险就可以降到最低。”吴伟雄说。

吴伟雄认为，海南省农信社绿色金融发展的核心是“为农民放款，教农民技术，给农民经验，助农民增收，保农民还款”。“绿色金融牵手精准扶贫，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更应注重‘一手给资金、一手给技术’，只有教会贫困户技术，贫困户才知道怎么花钱，才会懂得挣钱，才能还得起钱。”吴伟雄说。

关注全球资本流动新趋势

本报记者 徐惠喜

近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向出现了新趋势。2015年发达经济体取代发展中经济体，成为全球FDI的主要流入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则从FDI输入国一跃成为新兴的对外投资大国。原因何在？博鳌论坛上一场题为“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新趋势新力量”的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对此作了详细剖析。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经济外向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过去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是贸易主导，现在则是资本主导，资本输出大于资本输入。对外投资激增，这是中国实力的重要表现。”中国民生投资集团总裁李怀珍指出，从对外投资主体来讲，民营资本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民营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原始积累，实力很强。“资本积累到一定量时，一定会找市场找出路，不管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

安邦保险集团CEO吴小晖表示，中国对外投资流量去年高居世界第二位，与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的地位相符。但从投资存量看，中国累计对外投资约1万亿美元，美国则超过4万亿美元，美国去年对外投资流量为3500亿美元。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和美国在对外投资方面都遵从同一个市场规律，当一国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随着全球产业链的整合，对外投资是不可逆转的趋势。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会走向越来越广阔的天地。

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呈“井喷”态势，还有需求侧的原因。中国投资公司前总经理高西庆指出，国际国内的投资银行促成了大量民企到海外投资。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和初期，西方国家普遍欢迎中国企业前往投资，形成一股国企对外投资热潮。但从2010年起，随着美国等从危机中逐渐恢复元气，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一些欧洲国家外资管理部门开始对中国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提出很多问题，而且越来越尖锐，使得中国企业被强制审查，并购案被否定。在国企海外并购受阻的情况下，国内外投行提出让民营企业“走出去”，这从需求侧催生了民企的海外投资热潮。

如何看待未来的全球资本流向？“过去10年，我们看到的最主要趋势是新兴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亚太区总裁金秀咿表示：“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是未来的资金热点。”

万泉河畔起新城

本报记者 何 伟

万泉河畔，一座规划面积为20.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坐落着众多世界领先的医疗养生机构，这里就是被称为博鳌亚洲论坛“第二乐章”的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2013年2月28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同意设立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批复》，并量身定做了9项特殊政策，被人称为“国九条”，先行区正式成立。

面对这个含金量极高的特殊待遇，海南省委、省政府紧锣密鼓地开展规划建设。2015年12月29日，首批7个项目在乐城开工建设，试点发展医疗、养老、科研等国际医疗旅游相关产业，正式奏响“博鳌亚洲论坛的第二乐章”。

一年多来，乐城先行区对接项目达92个，正式受理项目58个，通过医疗技术评估项目36个，已举行开工仪式项目27个。康乐路、乐天路、心怡路、康祥路等道路设施已完工通车。

在宽阔的康祥路上，占地56亩的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格外显眼。从今年1月13日试营业以来，这里已接待3000多名会员参观体验。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负责人石锐说，借助国家优惠政策，一龄将实现快速引进药品和器械。“原来需要5年至8年时间引进，现在只需要1年至2年。”

为了让企业受益，海南省采取了多种措施。海南省政府办公厅牵头成立了进口药品和医疗器械快速办理协调机制，成美、恒大等项目已完成部分药品进口；在大型医用设备审批方面，恒大、麦迪赛尔等项目已取得甲类大型医疗设备配置证；在干细胞临床研究方面，多个项目已落地并形成产业集聚，分布在转化医学、再生医学、精准医学等方面；在医疗人才引进方面，境外医师在先行区内执业时间试行放宽至3年，已出台详细的操作规程；在关税减免方面，恒大、成美等进口药品及器械已享受关税减免政策。

乐城先行区的建设彰显了“海南速度”。2016年落成的海南省肿瘤医院成美国际医学中心，建设计划工期2年，但在克服了征地青苗清表、施工用电、运输道路等难题后，把工期缩短至4个月。工期缩短至六分之一，如何做到的？“政府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企业办手续非常方便。”海南省肿瘤医院成美国际医学中心项目投资方海南一投董事长蒋会成说，这是给先行区企业最大的红利。

据了解，海南省政府将博鳌乐城先行区列为简化行政审批改革试点园区，实行极简审批，审批事项由原来需要省级8个部门和市级14个部门分别审批，缩短变为省级4部门和市级1个部门审批；社会投资项目从准入到落地需要办理项目选址意见书等32项审批，全部取消；社会投资项目落地所需时间由429个工作日大大缩短至57个工作日。

本版编辑 徐 胥